



善于积小胜为大胜

□ 周 一

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中，把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、战略相持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，而中国军民之所以能够取得战争最后的胜利，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实力在“质”和“量”两个方面都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一次局部的胜利都成为我方在全局天平上的砝码，积小胜为大胜，在胜利成果的不断累积之下，最终实现了强弱地位的互易和战争局势的扭转。

一般来说，积小胜为大胜是弱者在面对强者时，求取胜利的不二法则。从表面上看，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，武器装备、训练水平、民心向背、战争时机等都有可能对战局走向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。但是，从本质上讲，参战双方的综合实力才是决定胜败的根本原因，不管在外化形态上多么先进的战争，都要遵循强胜弱败的丛林法则。小到基本作战单元，大到国家或者政治集团，只要在战争开始之时处于实力对比的劣势，想要达成一蹴而就、一劳永逸的决定性胜利是不可能的，也是违背战争基本规律的徒劳妄想。只有通过不断积累胜势，以增强自身、削弱对手，在实现了综合实力强于对手的转变之后，才有可能扭转战局、取得胜利。

对于强者而言，积小胜为大胜同样是一种符合战争自然逻辑，有利于实现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。战

争是一种高层次的对抗活动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因其对交战各方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杀伤性与破坏性，就有可能对广大人民，尤其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的基本生存权利产生难以估量的潜在威胁。基于这样的考虑，战争指导者必须坚持极为审慎的态度，抓细抓小、循序渐进，以抽丝剥茧般的细致与耐心拨开战争迷雾，从而率领人民群众跨过重重困难，踏上“胜利的坦途”。倘若犯了战争的“急性病”，总想和对手来一场决定国运的战略决战，就很容易被人抓住弱点、避实就虚，使原有的优势特长不能够得到充分发挥，轻则延缓战争进程、削弱胜利效果，重则受累于要害之伤、失去继续战斗的能力。

从逻辑顺序上来看，积小胜为大胜，也是低层级战果向高层级战果转化的过程，以战役战术上的“小胜”为基础，以战略全局上的“大胜”为目标。历史地看，战争是具有比较明显的层级特点的，并且随着人们对战争认识的不断加深和战争经验的不断丰富，其层次性的表现更为明显。比如原始社会的战争，通常起因简单、发展迅速，没有过多的运筹谋划，以最为简单的肢体对抗进行战斗。现代战争，不仅要有战略层面的政治考量，同时也要兼顾战役战术层面的排兵布阵、作战协同等内容，抓住从小胜到大胜的关键节点。

从战略上来说，要善于把握全

局特点，对诸如战争性质、人民利益等根本性问题要有理性分析和科学认识，并以高度的战略自信和极强的战略定力进行战争谋划和实践活动。就人而言，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”，要想成为战略层面的设计者和指导者，就要有扎实长久的基层调研和工作经历。毛泽东之所以能在民族危亡之时写出《论持久战》，成为指导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逐步走向胜利的基本方略，与他长期深入农村和军队调查研究，细致科学地总结归纳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有着密不可分的重要关系。

战略设计不是空中楼阁、主观臆断，如果没有大量的事实依据做铺垫、打基础，很可能造成路径上的根本错误。此外，落实战略计划的信心和定力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虽说“胜败乃兵家常事”，但不管是作战部队还是人民群众，都欢迎成功而力避失败，对大胜的喜欢程度也远超过任何一次小胜，这从根本上说是人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本能追求，无可厚非且无法避免。而要实现由小胜向大胜的转化，关键在于对战争节奏恰到好处的把控和解读，让战争参与者明晰己方所处的地位和状态，增强对小胜的认同感、获得感，以思想共识启发行为自觉，推动战局朝着既定的战略方向发展。

从战役战术上来说，要善于区分全局与局部、一般与特殊，在严

格落实战略方针的基础上，由点到线、由线成面，集聚起克敌制胜的磅礴伟力。简单来说，积小胜为大胜，其实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但是为了增强战争效益，减少战争对人民群众的危害，必须在量变的过程中同时关注好“量”和“质”两个方面的内容。不管战争形态如何演变，物质上的实力都是衡量强弱的重要标准，每消灭一个敌人、摧毁敌军的一件装备，都会让自己的胜算多一分、让敌人的被动多一分。

同时，也要抓住可能由小向大嬗变的关节，打好影响军民士气的正义之战、促进态势转变的节点之战、接近战斗顶点的意志之战、塑造开篇布势的开局之战、危及战争成果的收官之战等等，在关键局部上倾注战役乃至战略的力量，抓住要害以确保万无一失。比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上甘岭战役，当若干小高地上的得失已经关乎战役全局、军心士气甚至是谈判进程的时候，从指挥谋划到保障力量，都从战略层面向战役战术的要点聚焦，抓住了积小胜为大胜的关键，取得了来之不易的宝贵胜利。



人民军队的战场救治能力建设

□ 罗 晓

系列方针、原则。

抗日战争时期

抗战时期，各部队任务区域高度分散，大小战斗频繁，交通条件滞后，伤员转运困难。八路军总卫生部根据抗战初期的战争特点，研究出台《暂行卫生法规》，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。

加强火线抢救。一般以团为单位开展战救行动，团救护所由卫生队人员组成，按手术、换药、看护、搬运等分工设组，部署在主营后侧有利地形。战斗中，将营救护所展开在主战连附近，承担前接火线伤员和补充包扎任务。配齐连卫生员，明确卫生员只做包扎、止血、固定和搬运，开展群众性的急救互救教学和急救包使用培训。对伤员进行初步救治后，及时组织分类留观或后送。

改进战救技术。白求恩医生来华后，针对八路军后方医院创伤感染严重的情况，提出医疗队上前线，开展早期手术治疗的建议，白求恩提出：受伤后24小时内必须及时清创，骨伤应立即上夹板，以防预防创伤感染和减少残废、死亡。各部队采取多种办法预防创伤感染和合并症，区分感染创伤或非感染创伤，针对性实施清洗消毒，改善换药方法。1938年，白求恩还在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倡导建立了志愿输血队，发动部队指战员、医务人员和群众无偿献血。输血技术的引进和推广，挽救了大量失血伤员。

完善保障体系。在战争实践中，多数部队都建立了一套适于游击战的卫生装备，其特点是：体积小，功能全，使用方便，携带轻便。充分利用各种运输工具，包括汽车、马车、担架等，组成后送梯队，确保伤员能够得到及时转运。到抗战中后期，师和军区以上医院，大都可以实行清创刮创、截肢、弹片摘除、血管结扎、骨折固定、胃肠吻合等战伤手术。对骨折伤的治疗有了显著改进，降低了伤员残废和死亡率。

在分散游击的抗战环境中，八路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，奋力开展战伤救治，有效地降低了伤病员死亡和致残率，大量伤员康复归队。平型关伏击战、百团大战、冀中

“五一反扫荡”等重要作战任务中，战场救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解放战争时期

解放战争中，国共双方从小范围摩擦逐步走向大兵团正面激烈对决，为保障军队战斗力和指战员生命安全，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战场救治。

建立完善的野战医疗体系。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制定了《战伤处理暂行简则》，规定了火线救护工作的明确任务和技术要求；战地救护主要任务为紧急包扎、暂时止血、临时固定、脱离火线，即包扎、止血、固定、搬运4项技术。火线4项技术的推行，极大提高了战场阵地救护水平。随着战争资源的丰富，解放军建立了一批前线急救站、后方医院和康复中心等，这些医疗机构配置了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药品，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。陆续引进现代化医疗设施，如便携式X光机、输血设备等，提高了救治效率和准确性。

加强医务人员培训选拔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许多医务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，因此军队开展了广泛的培训课程，提高医务人员的救治能力和技术水平。此外，军队还从各地招募和选拔优秀的医务人员加入救治队伍，确保伤员得到专业、高效的救治。着眼尽快提高战伤救治成效，各解放区部队剖析二战中军事强国的野战外科经验，广泛学习应用战伤救治新技术。

持续改进战救技术和管理。同时，军队还加强了救治工作的组织和管理，优化了救治流程，确保救治工作高效运转。1946年10月，晋察冀野战军发布《野战战地治疗工作暂行条例》；1948年1月，东北军区召开卫生大会，制定了早期切除术、间断交换绷带、休克处置、战伤骨折固定、头胸腹部战伤处理、战伤截肢、破伤风预防及处置等系列战伤医疗条例，将战伤救治技术的规范化、制度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。

通过不断改进和创新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实践中探索形成了攻坚战、防御战、追击战、渡江渡海等不同类型战斗的战场救治策略，为后续的战场救治

和医疗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。

抗美援朝时期

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第一次赴国外执行作战任务，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劣和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代差，伤员数量众多且救治条件有限，抗美援朝战场救治经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。

因地制宜实施战场救护。敌军炮火猛烈，我军一线战创伤救护需求突出。志愿军在战场上，设立了多个急救站和包扎所，配备有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和必要的医疗设备。这些急救站和包扎所能够快速对伤员进行初步救治，控制出血、包扎伤口、抗休克等，为后续治疗创造条件，并摸索出一套具有我军特色的山地抢救经验。针对多发伤情，简化急救药材目录，初步实现了标准化供应。开展实战总结反思，调整组建抗休教室、复苏室，有效减少了战伤死亡。成立野战供血组织，保障前线医院和师救护所实施输血治疗。

灵活机动开展医疗后送。由于战场地形复杂、敌情多变，志愿军伤员转运尤为不易，往往先是人力担架进行山地转运，再经由运送物资的军车，最后换乘铁路回国医治，救治人员需要具备高度的应变能力。他们根据伤员病情和战场地形，合理安排后送路线和治疗方案，采取了就地救治、后送治疗相结合的方式。通过伤员检伤分类工作和阵地战医疗后送体系，优先救治重伤病员的同时，确保前线有限资源实现轻伤病员留治。

及时应变，注重卫生防疫。因为对朝鲜半岛地理医学、流行疾病情况不够熟悉，志愿军入朝后曾发生大批冻伤、营养缺乏症、夜盲症、虱媒传染病等疾病。军队卫勤机构在有序组织战伤救治的同时，针对低温、虱媒传染病、营养不良等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逐一提出解决方案，包括成立接种疫苗、成立野战机动传染病医院、抽调专家组成一线检验队等，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卫生防疫制度。

战救犹如战争中的矛与盾，只有矛尖盾固，不断建强“打仗型”卫勤，方能捍卫和平安宁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。

伴随防空是指在作战行动中，与作战部队或重要目标保持近距离协同，实时提供防空掩护的防御方式，其核心是通过动态伴随、灵活部署的防空力量，应对敌方空中突袭，保障被掩护对象的空中安全，具有反应迅速、针对性强、与作战行动高度融合的特点。

伴随防空的演进之路

在现代战争的立体战场环境中，空中威胁始终是地面部队的致命挑战。从超音速战机的俯冲突袭，到察打一体无人机的精准侦察，再到巡航导弹的低空突防，各类空中目标正以更隐蔽、更快速的方式渗透作战体系。

伴随防空的发展始终与地面作战需求同频共振。二战时期，机械化部队的闪电式推进使传统固定防空阵地逐渐失效。1944年7月的利沃夫战役中，苏联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在向德军纵深推进时，由于脱离了后方高炮部队的掩护，遭遇德军Ju-87“斯图卡”俯冲轰炸机和Fw-190战斗轰炸机的轮番空袭。苏军因空袭损失的装甲装备占总损失量的14%，暴露出机动中防空能力的致命短板。这一教训直接推动了伴随防空装备的研发。

二战后，苏联率先实现装备突破。1955年列装的ZSU-57-2双管自行高炮，以T-54坦克底盘为基础，搭载两门57毫米机关炮，最大射程4公里，射速120发/分钟，首次实现与坦克部队的同步机动。但该装备存在火控系统简陋、命中率低的问题，在面对高速喷气式战机时力不从心。20世纪60年代，ZSU-23-4“石勒喀河”自行高炮与9K31（北约代号SA-9）地空导弹的组合应运而生，两者配合构建起团级单位的多层防空网。

美军则在冷战期间另辟蹊径。20世纪60年代装备的M163“火神”自行高炮，采用6管20毫米加特林机关炮，射速高达3000发/分钟，主要用于近程防空。同时期列装的M48“小榭树”防空导弹系统，射程8公里，采用光学瞄准加红外制导，用于中程拦截。但这些装备在信息化战争中逐渐显露出协同不足的问题，“火神”高炮缺乏有效的雷达引导，“小榭树”防空导弹抗干扰能力较弱。直到21世纪初，机动近程防空系统（M-SHORAD）项目落地，基于“斯崔克”装甲车的弹炮合一系统才让美军重新具备现代化伴随防空能力。该系统整合了4枚“毒刺”导弹、一门30毫米机关炮和一挺7.62毫米机枪，配备先进的光电探测系统和雷达，可有效应对多种空中威胁。

“导弹+高炮”的复合配置

伴随防空的核心优势在于“动态伴随”能力。其装备普遍采用履带式或8×8轮式装甲底盘，具备出色的越野性能和机动速度。如“道尔-M2”防空导弹系统采用T-72坦克底盘，越野时速可达60公里，最大行程500公里，能与装甲集群保持同步推进。在复杂地形条件下，其悬挂系统可根据地形自动调节，确保在泥泞、山地等环境中平稳行驶。这种机动性彻底改变了传统防空“守株待兔”的模式。传统防空武器需要预设阵地，在部队机动过程中往往存在防空真空期，而伴随防空系统能紧随部队行动，在行军、突击、转移等全流程中均处于防护状态。

现代伴随防空系统普遍采用“导弹+高炮”的复合配置，形成多层次的拦截体系。除了防空导弹，自行高炮被誉为“移动的弹幕发生器”，是伴随防空的近程火力支柱。德国“猎豹”自行高炮是典型代表，它以“豹”1坦克底盘为基础，搭载两门35毫米机关炮，单门射速550发/分钟，可发射高爆弹、穿甲弹等多种弹药。其配备的脉冲多普勒雷达最大探测距离15公里，能同时跟踪多个目标，并在行进间对时速800公里的目标实施有效命中。但“猎豹”造价高昂，单台成本约3000万美元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大规模列装。

弹炮合一系统将导弹和高炮有机结合，实现了“一装多能”。新型弹炮合一系统将35毫米高炮与防空导弹集成在同一底盘上，导弹采用雷达制导，射程可达10公里，主要负责3—10公里的中远程拦截；35毫米高炮射速500发/分钟，有效射程3公里，负责0.5—3公里的近程防御。这种组合既发挥了导弹的高精度优势，又利用高炮的高射速弥补了导弹抗饱和和攻击能力的不足。通过分层拦截技术，该系统对巡航导弹、无人机等低空目标的拦截成功率提升至85%以上。作战过程中，系统通过先进的火控计算机实现火力协同。如面对多批次、多方向来袭的目标时，可根据目标距离和威胁程度，合理分配导弹和高炮火力，实现高效拦截。

如今，有些先进的伴随防空装备，采用8×8轮式底盘，具备良好的战略机

陆军的移动「保护伞」

□ 高 航

动性。配备的相控阵雷达可同时跟踪40个目标，并优先拦截12个威胁最大的目标。导弹采用垂直冷发射技术，可360度全方位攻击，射程15公里，能有效拦截各类固定翼飞机、武装直升机、无人机、巡航导弹等目标。这类装备既可单车独立作战，也可融入作战体系实现协同作战。

在实战检验中前行

伴随防空需突破多重技术瓶颈。一是成本压力巨大，先进的雷达系统、制导武器和装甲底盘使得伴随防空系统单价普遍超千万美元，大规模列装是不小的负担。二是对抗不断升级，随着隐身技术和高超声速技术的发展，现有伴随防空系统面临严峻挑战。隐身目标可使雷达探测距离缩短50%以上，高超声速武器则压缩了系统的反应时间。三是电磁环境复杂化，现代战争中电子战贯穿始终，敌方通过电磁干扰可使伴随防空系统的雷达迷茫、通信中断、火控系统失效。四是多平台的数据链融合仍存在延迟。在复杂作战环境中，伴随防空系统需要与预警机、战斗机、其他防空单元实时共享信息，但目前数据传输速率和处理能力有限，往往导致目标信息更新不及时，影响拦截效率。

近年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成为装备检验场，各类伴随防空装备在战场上接受了严峻考验。有的防空系统先进的相控阵雷达能有效发现低空飞行的无人机，但在面对无人机蜂群攻击时，暴露出火力持续性不足的问题，因高炮弹药消耗过快，导致部分目标突破防线。有的自行高炮凭借其高射速和精准的火控系统，成功拦截了多枚巡航导弹，但其雷达系统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性能有所下降，需要其他侦察设备提供目标指引。

这些战例既印证了伴随防空的实战价值，也为其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。一是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，通过AI算法实现目标威胁排序与自主拦截决策。AI将深度融入伴随防空系统，使其能快速分析目标类型、飞行轨迹、威胁程度等信息，自动生成最优拦截方案，反应时间从秒级压缩至毫秒级。二是无人化趋势明显，发展车载无人机群构建“防空+反导+反无人机”的立体防御。车载无人机可前出侦察，扩大预警范围；也可携带战斗部实施自杀式攻击，拦截来袭目标。三是体系化融合加深，与预警机、卫星、歼击机形成数据共享。届时，伴随防空系统可接收预警机提供的远程目标信息，引导歼击机对远距离目标实施拦截，自身则专注于近程防御，形成全域协同拦截体系。

这种演进将使伴随防空从“被动防御”升级为“主动防护”，不仅能有效应对现有空中威胁，还能适应未来战争形态的变化，成为地面作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保障力量，为陆军在复杂战场环境中遂行作战任务提供坚实支撑。

